

閻錫山幡然歸中央

喬家才

徐永昌將軍的傳奇之三

倡言要驅逐惡勢力

徐永昌原打算統率國民三軍在五原屯壘，希望閻錫山能够大力幫助，商震要他到歸綏當面談。此時馮玉祥感覺國民軍在西北待不下去，要徐永昌去一趟太原，說服閻錫山和國民軍合作。因此他把部隊交給總參議楊祥徵照顧，先去歸綏會晤商震，再轉往太原。在和閻晤面以前，孫楚奉命先來交換意見，以免見面時，因意見不同，造成尷尬局面。

孫楚告訴徐永昌：「閻錫山先生說，第一不談國民黨，第二不談革命，第三閻先生自己好講中的道理，凡事主張中道。」

徐永昌很同意這三點意見，表示自己不懂革命，他也主張中道，不贊成偏激。所以，他和閻見面，談的很愉快，很投機。閻表示從春天到秋天，奉軍晉軍和國民軍作戰，國民軍是失敗了。但他以為這是舊勢力和新勢力作戰，最後的一次勝利。

過兩天閻錫山為徐永昌舉行正式宴會，田應璜（子中）也作陪在座，他代表山西去東北，剛

從東北回來，談話中對奉軍極表讚揚。宴會快要結束時，溫壽泉（靜庵）要他說幾句話。

「前天閻先生對我說，舊勢力最後抵抗不了新勢力。我也有點感想，就是兒子要當權的時候，也就是其父快要完的時候。近幾年張漢卿（學良）很出風頭，很活躍，所以我斷言張雨亭（作惡）快要完了。今天我們要求進步，救社會，是要反奉張的。談革命我不懂，驅逐惡勢力我知道。凡是有血性的都應當向惡勢力搏鬥。」閻錫山祇是笑笑，沒有表示意見。

這個時候，張作霖和吳佩孚又翻了臉，奉方驅逐了吳在河南的勢力，張作霖在北京自稱安國軍大元帥，要閻錫山做他的副元帥，否則，就對山西不客氣。田應璜有為奉張幫腔的味道，所以徐永昌發表了以上的意見，意在阻止閻答應奉張的要求，不要做甚麼副元帥。

徐永昌這次到太原，本打算住十天八天，就返回防地，因閻錫山一留再留，要和他多談談，走不了，一住三個多月。在這期間，他和山西的將領們相處的很和諧，建立了深厚友情，奠定了國民三軍和晉軍合作的基礎。

當國民二軍在河南失敗，軍長岳維峻化名進到山西，到達榆次，就被山西憲兵逮捕，關在憲兵司令部。岳不露真實姓名，閻錫山也裝做不知道。徐永昌知道實情後，立刻營救，才恢復了岳的自由，並親自送到離石，看着他安全渡過黃河。

駐綏西的國民一軍受奉軍萬福麟壓迫，放棄綏西，向寧夏方面撤退。國民三軍不願意和他們同路行動，由達拉特王府向南，經東勝到達陝西的西北角神木、府谷。三軍的第五旅續範亭和國民二軍的弓富魁都不願意靠近山西，和三軍分道揚鑣，而跟一軍行動，走到石咀山，石友三奉馮玉祥命，把他們包圍繳械。這兩部分反閻的部隊，無形消滅。

徐永昌得悉三軍已經開到神木、府谷，趕緊離晉返防。臨行南桂馨（佩蘭）對他說：「閻錫山先生要我告訴你，東邊情形不穩，恐怕會有事。如果有事，希望你把部隊帶到山西來。」

回到神木不久，就接到南桂馨的電報，要他把部隊儘量靠近山西，趕緊來太原一趟。到達後才知張作霖逼閻錫山就任副元帥，所以要國民三軍趕快渡河，好以客軍入晉為藉口，以應付張作

霖。三軍過河，駐於汾陽一帶。

三軍駐包頭時，馮玉祥給他們介紹了三個政治工作人員，其中一個杜鴻成，山西平定縣人，是個共產黨黨員，到達汾陽以後，私自張貼「打倒張作霖、閻錫山、蔣介石」的標語。

閻錫山聽到這個消息，非常吃驚，認為事態非常嚴重，讓打倒張作霖、蔣介石和閻錫山的軍隊駐到山西，教他怎樣向奉張和南京解釋呢？趕緊派孫楚去汾陽調查。孫楚到達汾陽，看見部隊並沒有甚麼舉動，回去向閻錫山報告，閻還是不放心，再派楊愛源去察看。

徐永昌於楊愛源到達的當天下午，集合部隊，請楊檢閱。楊愛源看到他們的裝備簡單的可憐，但很整齊。營舍中每一士兵祇有一件小皮襖，下面一塊磚頭做枕頭，此外別無他物。而士兵的精神抖擻，軍紀極好，地方人士有口皆碑。

楊愛源本來是去查看他們反閻反蔣的情況如何，結果了解了這個部隊的真實情形，以為將來很能幫助山西作戰。至於張貼反閻、反蔣標語，係一二人行為，並不影響部隊。回去向閻錫山報告，才免去憂慮，以後三軍和晉軍合作無間，這真是因禍得福。

聯晉討奉協助北伐

民國十六年六月三日山西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六日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七月十七日晉軍佔石家莊，但與奉張尚有代表往來。九月二十九日閻始誓師討奉，十月三日張作霖也通電討閻錫山。此時因蔣中正總司令已

於八月十三日辭職下野，北伐已經停頓，故山西對奉戰爭，形成獨力作戰，頗為吃力。

閻錫山命商震為國民革命軍北方軍北路總指揮，由京綏路出擊，以楊愛源為東路軍總指揮，率本師與楊效歐、趙承綏師及國民三軍出擊京漢路。徐永昌為副總指揮，率三軍由平山推進到行唐，渡過唐河突襲，奉軍潰退。三軍追擊，過定州未停，快到望都。奉軍戰翼翹騎兵由東邊迂迴，襲擊定州，楊愛源、楊效歐等師西撤，時為十月十日。十二日由紫荆關出擊的傅作義師已佔涿縣城，堅守不退，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傅作義守涿州」。

定州既已撤退，三軍不能單獨前進，祇好也向後撤。徐永昌聞知楊愛源諸師及周玳砲兵由曲陽向龍泉關撤退，他認為這樣撤退很危險，趕快去告訴楊愛源和周玳：「閻公駐東長寺，大部分兵力都在前方，正太路空虛，極應重新部署，各師向平山、獲鹿來路後退。否則，若奉軍乘虛南下，直攻太原，後方危險。況且一入龍泉關，野砲都得委棄，將來如何對敵作戰？」各師才醒悟，趕快改正撤退路線，不予敵乘虛而入的機會。

閻錫山總司令退到井陘，改委徐永昌為東路軍總指揮，楊愛源副之。閻擬放棄前線，退守井陘一線山地，徐永昌以為井陘山地未構築防禦工事，且缺飲水和燃料，山地雖險，反更困難。堅持以一部分兵力堅守前線，非待山地佈置妥當，絕不撤回。乃以楊效歐師固守獲鹿前線，國民三軍固守平山前線。

前線雖有幾次接觸，來犯敵軍都被擊退。從

截獲張學良給何柱國、王樹常及戰翼翹等的命令，要他們「盡力攻，盡力追，在本月內上太原喝醋去。」證明徐永昌對撤退時的顧慮，非常正確，不過奉軍也太不爭氣，沒有讓張學良喝上山西醋，一大憾事。

蔣中正總司令於十七年一月二日復職，繼續北伐。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蔣總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分任第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四月一日蔣總司令抵徐州，準備總攻擊。李宗仁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由京漢路北進，參加北伐。

徐永昌以第三集團軍東路總指揮，沿京漢路向北挺進。抵望都時，接受奉軍安錫燾投誠，交閻錫山總司令改編。

五月三十日奉軍放棄保定，第二天徐永昌進入保定，奉閻錫山命，駐守保定，追擊任務，改由北路總指揮商震追敵北進。六月二日張作霖通電退出北京，四日返回東北，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八日商震所部克復北京。

奉軍主力雖然退到關外，但直魯聯軍張宗昌、褚玉璞殘部還有數萬人，既不出關，又不投降，盤據灤州一帶，準備頑抗。所以北伐雖已完成，而戰爭並未結束。蔣中正總司令命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負責肅清直魯聯軍殘敵。此項掃蕩任務，以第三、第四集團軍為主力，第二集團軍也以部分部隊參加。

白崇禧命第二集團軍韓復榘和第四集團軍李品仙兩軍向山海關推進，但韓復榘逗留軍糧城，

並不前進。徐永昌路過軍糧城時，與韓復榘見面，韓告徐已奉馮命，撤回河南，並警告徐永昌也不要，韓復榘說：「直魯聯軍的力量還很強大，你們沿津榆線過塘沽，幾乎四面是水，只有中間一條鐵路，此去恐怕很難回來。」

徐永昌說：「你們知難而退，對不起朋友，我却不能像你們那樣做。」

韓說：「按照馮先生的命令，我們須立刻就走。可是看我們朋友份上，可以緩緩開拔，好收容你們。你們會很快地敗退回來。」

九月九日攻擊部隊克復唐山，徐永昌率部由唐山推進到灤河，無力強渡灤河，攻擊前進。乃派呂汝驥率騎兵從灤河下游偷渡，進行大迂迴。九月十三日一舉克復灤州，於是兩面夾擊，敵軍全線動搖，或退出關外，或渡河投降。灤東肅清，北伐才真正完成，這是徐永昌的功勞。

放下軍權三軍歸制

徐永昌一生，不慕虛榮，不貪權勢，正直無私，是非分明，絕不含糊。十七年十月他被任命為綏遠省政府主席，他認為實行民主政治，應當以身作則。省政府主席管理民政，是文官，不應再掌握兵權。既要做省政府主席，就必須將軍權交出來，於是對國民三軍做了一番妥善的安排。

國民三軍由十五旅演進而來，始終由孫岳統率，孫常常生病，軍務全靠徐永昌負責。孫岳對他信任，他對孫岳忠誠，合作無間，毫無芥蒂，才使國民三軍壯大起來。以後他做了三軍軍長，仍尊孫岳為三軍的領袖。孫岳雖離開三軍，始終

跟着三軍走。三軍駐包頭，他在包頭；三軍去神木，他也去神木；三軍以客軍入晉，駐汾，他也到了汾陽養病。三軍參加北伐，離開山西，他才到了上海醫病，孫徐友情，始終如一。

第二次北伐開始，中央任命徐永昌為第十二路軍總指揮，他不拒絕，也不接受。他以為：第一，國民三軍是孫岳的部隊，孫在上海養病，他不能藉此做總指揮。第二，三軍入晉以來，閻錫山總司令對待他們和晉軍一樣，現在隔開閻總司令，擔任中央政府的總指揮，也對不起閻錫山，因此不能接受。

孫岳病逝上海，徐永昌在保定開會追悼，迎靈柩於天津，安葬於北京西山，建國民三軍昭忠祠於臨近保定的滿城一畝泉，對生者、對死者，都做到仁至義盡，無愧於心。現在既要擔任文職，必須交出軍權。孫岳已死，國民三軍番號沒有再保留的必要。於是決定將部隊交給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總司令，成為晉軍的一部分。

他將三軍原有的部隊整編成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一個砲兵團。為了能適應山西的環境，妥為調整人事，以馬延壽、方克猷分任步兵師師長，呂汝驥任騎兵旅旅長，梁鑑堂任砲兵團團長，派副團長黃盧初將名冊送給閻錫山。

這次軍權轉移，並不簡單，當徐永昌召集三軍的幹部宣布這項決定時，多數幹部都表示反對，有很多人情緒很激動，副團長黃盧初甚至痛哭流涕地說：「你出賣三軍，換取主席。」

徐永昌靜聽大家盡情發言以後說：「北伐完成，國家統一，中原逐鹿，已成定局。我們已不

可能於各集團之外，再成一個集團，不歸此，即歸彼。本軍係督辦孫岳先生所創立，現孫先生已長逝，國家已統一，已非過去情形。所以，我自行整編，務求能適應現實環境。現在部隊還是自己人帶，歸屬第三集團軍建制，大家好好幹，大家都有前途。這樣做都是為了國家，為了兄弟們，絕不是為我個人打算。如既不歸此，亦不歸彼，難道要擁兵自為麼？」

因為這部分武力能打仗，紀律好，很受閻錫山重視與歡迎，歸第三集團軍後，絲毫不被歧視。馬延壽師歸孫楚軍，方克猷師歸楊耀芳軍，呂汝驥旅歸趙承綬騎兵軍，梁鑑堂團歸楊澄源軍。

屯墾賑災挽救綏遠

十五年國民軍大軍退到綏西，已經使綏遠民窮財盡。十七年十一月徐永昌主政綏遠時，又遇上旱災，糧食奇缺。民以食為天，缺乏糧食，野外餓死的災民到處都有，連歸綏市內也有死屍。再加上土匪橫行，真是民不聊生。所以當時綏遠省迫切需要的，就是救災和剿匪。剿匪有晉綏軍負責，他可以不管，救災却成了他的最大責任。

為了救災工作有效切實，徐永昌自找到兩位極有幫助的對象，一位是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常委兼東北賑委會委員長朱慶瀾（子橋），另一位是華洋義賑會主持人張元善。張元善不僅全力支持他，而且很感慨地對他說：「你是我所見的第一位關心老百姓死活的大官，我從來沒有見過一位省主席這樣的大官，為老百姓親自來商討賑災的。」

朱慶瀾說做就做，將在東北籌募的糧食，每星期裝載一列火車運到綏遠，不知救活了多少災民。朱慶瀾不特運糧賑災，還答應注意到未來的耕種問題，選運各種農作物的種籽，改進農業。

華洋義賑會以二十五萬元（約合十三萬美元）配合省政府自籌的二十五萬元，共五十萬元，開築薩拉齊附近的黃河民生渠，以工代賑，救活了災民，又為綏遠省水利建設向前邁進一大步。

徐永昌鑑於綏遠地廣人稀，極待開發，又看到各集團軍擁有龐大的部隊，實非國家之幸。養那麼多的兵，是自衛嗎？還是另有施為呢？所以他主張屯墾，既可以充實邊防，又可逐漸化兵為農，減輕國家和老百姓的負擔。

他曾向閻錫山建議，讓他在綏遠試辦屯墾，先由第三集團軍撥出一萬人，借兩個月的餉，購置農具，由公家撥款建造營房，三年以後，就可以使五千人變成當地居民，或者全部留在該地，成為農民，這樣分批繼續進行。以三年軍餉進行無後患的實邊編遣，對國家、對社會都是有益的。

閻錫山很讚賞他的構想，表示支持，可惜徐永昌在綏遠沒待多久，調為河北省政府主席，這個很具建設性的屯墾編遣構想，沒有實現，非常可惜。

開發水利濟冀旱災

十八年九月，徐永昌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當時河北省政府設在北平中南海旁邊的攝政王府。他看到永定河泛濫成災，沿河一片汪洋；而入

夏以來，各地缺雨，又鬧旱災。所以與辦水利，成了他施政最大目標。永定河沿河防災，關係上游各省，非一省力量可以單獨完成，防旱則刻不容緩。

河北省除西部太行山區，平漢路以東都是平原，地平土淺，若用機械打井，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水源，所以打井防旱，效用極大，問題是如何籌措這一筆打井的經費。徐永昌招待平津銀行團，要他們做做好事，貸款給老百姓，好興辦水利。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經理卞白眉告訴他，銀行是商業性質，借款須有抵押，祇要有抵押，他們就可以拿錢出來。

他找朱慶瀾商量，朱說熊希齡（秉三）有經驗，可以想辦法，遂偕同找熊研究。熊說：「這是老百姓的事，須從老百姓身上想辦法。」他計算長蘆鹽加價一年，再延長一年，可得三百五十萬，就可向銀行抵押貸款。

李石曾（煜齋）對此事也很熱心，他說：「貸款給老百姓打井，錢可以收回來，我們再以此款作抵，由庚款內息借三百五十萬元，共可得七百萬元。」於是成立了「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長蘆鹽加價經行政院核准，打井防旱計劃立刻實行。

當時河北省政府分擔部分第三集團軍的軍餉，但無預算，月月拖欠，不是省庫負債，就是軍餉發不出來。徐永昌覺得不是辦法，必須開源節流，決定裁減不必要的開支。省府有一營衛隊，他以為住在北平既有憲警，省府實無一營衛隊的必要，遂將衛隊營裁撤，如此，每月就可節省好

幾萬元。

說到開源，並不需要增加老百姓的負擔。祇要剔除中飽，稅收自然就會增加。他切實整頓稅收，嚴懲貪污，中飽剔除，稅收也增加了，從此省庫不再負債，也不再拖欠協助第三集團軍的軍餉。

中原大戰指揮若定

徐永昌以為北伐完成，國家統一，是國家步上富強康樂的開始，值得慶幸。他以身作則，首先放下軍權，取消國民三軍番號，將部隊交第三集團軍。十九年中原大戰，使國家分裂，消耗國力，他極不贊成，在醞釀期間，他曾向閻錫山建議三點：

「第一，你不要有上臺做領袖的心；第二，你不要輕視南京；第三，你不要去鄭州，鄭州是一個是非場所（當時唐生智在鄭州叛變，中央界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要他去鄭州平亂）。」

中原大戰前夕，南佩蘭從太原到北平，對徐永昌說：「我們與南京怕有戰事，你回太原一趟。」

徐永昌回太原見到閻錫山，閻問他：「佩蘭的話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有變動沒有？」

「已與人家簽字了。」

「與誰簽字？」

「張漢卿的代表。」

「去多我向你說過三句話，現在祇有兩句話說，第一，不要走打仗的路；第二，如一定要打

仗，不要和我商量打仗的事，也不要用作指揮官。」

「你這樣說，是否以為必敗？」閻問他。

「張漢卿如來合作，勝負未可知，否則必敗。我未聽說那位代表與張漢卿有何深切關係，如何能代表這樣大的事呢？」

「此時志同，即可道合，不必有何深交。祇要準備打仗，不一定要打仗。」閻似無意於打仗，他以為全國將領有那麼多人反蔣，又有汪精衛的改組派打着國民黨的旗幟反蔣，祇要他表明態度，蔣就會下野，仗打不起來，估計完全錯誤。

孫岳倒曹吳徐永昌不贊成，但孫岳要幹，他祇好跟着走，這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信條。現在閻要反蔣，他也不贊成，但已經反了，也祇好跟着走。馮玉祥指揮平漢路，閻錫山指揮津浦路。閻派他為隴海路總司令，楊愛源副之，與二集團軍鹿鍾麟共同指揮隴海路戰事。

在太原，徐永昌曾對鹿炳勛說：「你們（第二集團軍）本來是不得了，現在則有辦法了。不過你們將三集團團下水，結果必然弄得一齊沒有辦法。」

他指揮的部隊：晉綏軍孫楚、楊效歐、關福安、楊耀芳、張會詔等軍及趙承綬騎兵軍，和河南省主席萬選才五萬人、石友三四萬人、劉春榮兩萬人、孫殿英萬人、劉茂恩萬人，共有三十萬人，都在黃河以南。他請閻為他準備幾百條民船，配置黃河鐵橋附近，閻很詫異，仗還沒有打，先要準備船。

徐永昌說：「我統率如此大軍，在豫作戰，

不能無妥善後路，豈能單靠一黃河鐵橋？本來我可以自己安置，所以請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萬一之用。」

隴海線戰事，因劉茂恩俘虜萬選才歸順中央，劉春榮也有異圖，態度惡劣，堅持要兩百萬發子彈，石友三說入魯受阻，向後撤退，徐永昌針對當前情形，調整戰線，穩定態勢，與南軍對壘五六個月，屹立不移。他對馮玉祥了解很深，如果閻馮戰勝，馮會立刻翻臉，對閻下手，所以他必須保持晉綏軍實力，以防後患。

九月十八日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閻錫山也通電下野，二集團降的降，走的走，要使黃河以南的十五萬晉綏軍安全返晉，實非易事。但他從容不迫，全軍安全渡過黃河。原打算乘平漢車北上，因石友三駐在彰德以南，曾要孫連仲合作，截取三集團軍。孫為人不至出此，但為避免與他衝突，由修武上太行山，全師返晉。

輜重必須由平漢路運回，徐永昌派黃隆初押運，帶給石友三一封信用：「這列車上大多是官兵的行李，你可派人上車看看，有需要的，留下你用，如用不着，請派兵護送到石家莊，以免官兵行李無着。」結果石友三不但沒有扣留，反而極盡護送之責，意在等待徐永昌的大軍過境，不知他已深入太行而進抵高平了。

為蔣閻合作先鋪路

徐永昌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統率晉綏軍五個軍在河南作戰。戰爭結束，在中央軍緊逼，馮玉祥祇願遠走，而能使五個軍全師回晉，真不

容易。後來閻錫山去了大連，晉綏軍成了羣龍無首，他做過統帥，不能扔下不管。當時商震以三十二軍軍長兼山西省政府主席，他是地道晉綏軍出身，按照常理，應當團結敗退回山西的晉綏軍，安定山西。結果因對許多事處理失當，引起晉綏軍將領王晉國、孫楚、傅作義等反對，不能立脚，因石友三又叛變，乃借討石離開山西。所以徐永昌在山西的分量更顯的重要，成了晉綏軍團結的中心。

中原大戰雖然結束，問題還是很多。馮玉祥部的宋哲元、鹿炳勛、孫殿英、鮑剛、張人傑等退到山西，增加山西的不安。張學良撿了中原大戰的便宜，坐鎮北平，却不是安定的力量，華北人心仍在動盪，他要求徐永昌協助，會同李石曾，三人商定晉奉合作協議，安定華北的計劃。

馮玉祥戰敗逃到泰山，並不安分，仍在鼓勵舊部，製造糾紛，要徐永昌協助石友三反對張學良，驅逐奉軍出關，徐永昌不理。後來石友三在邢臺進行反蔣驅張活動，派代表到太原，徐永昌告訴他：「我不能幫助任何人再打內戰，他人我不管，請勿指望我。」

二十七年七月石友三正式造反，不到兩星期，就被解決了。

八月五日閻錫山由大連飛大同，回到故鄉五臺河邊村，引起很大的震撼。他飛返大同，當然係得到日本人的同意，否則，日本人就不會派飛機送他到大同，至於他和日本人有何決定，那就不是外人所知的。

中央對閻錫山返晉，當然憂慮，認為事態嚴

重，不到一星期，趕快發表徐永昌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希望山西情況不至於惡化。張學良對閻返晉，更不放心，非逼他離開山西不可。韓復榘對徐永昌說：「我已和張副司令（學良）說好，將我的部隊開到石家莊，非要閻走不可。」

徐永昌告訴張學良，山西的問題非常嚴重，由閻錫山回來解決問題，事半功倍。山西安定，華北才能安定。況且晉奉合作協議並沒規定不讓閻回來。他曾對閻錫山說過：「希望你將來不要靠武力回來。」現在他一個人回來，實無理由阻止。

張學良成見很深，徐永昌舌做唇焦，問題都沒有解決。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張學良自顧不暇，才撇開閻離晉。

二十一年十月徐永昌應召赴漢口晉謁蔣委員長，爲了疏解蔣閻的情感，促成團結，一再爲閻疏解，他對蔣公說：「閻是愛國者，勤儉，能深思，長處很多，最大限度不過是委員長的一個政敵，而不是叛國者。叛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

以後蔣閻合作無間，徐永昌這一席話很有力量。

提倡國貨根除日毒

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徐永昌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真除，到二十五年五月因肺病堅辭，主持山西省政，長達五年之久。二十一年二月國民政府特派閻錫山爲太原綏靖主任，晉綏軍才不再需要他照顧。

商震主晉時，因欲動用村政處保存的六十萬元，將村政處撤銷。徐永昌以爲村政處對於山西地方自治極爲重要，很有成績。真除主席後，首先恢復村政處，以樊象離爲處長。他告訴樊象離：「老百姓願意的事，今天就做；老百姓不願意的事，今天就不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今天就要革除。」

中原大戰結束，晉鈔貶值，一元貶到五分，五六千萬晉鈔，僅值二百多萬，財政困難，達到極點。而鮑剛、張人傑、孫殿英等駐軍橫征暴斂，推銷毒品，民不堪命。徐永昌全力促使這些駐軍早日離開，終於二十二年初，使這三部離開山西。又積極整理財政，才能使社會穩定。

閻錫山任綏靖主任後，兵工築路，修築同蒲鐵路，省政府全力協助，僅僅三五年功夫，便使縱貫山西北的交通大動脈——同蒲路通車，在全國交通建設上，可稱奇蹟。

徐永昌最痛恨日本經濟侵略，廉價傾銷日貨，他以提倡使用國貨，以爲對策。省政府通令全省公教機關，除非無國貨可資代替的必需品外，若有採用外貨者，一律以違抗政令論。連印刷報紙，都採用晉恆公司土紙，山西提倡國貨，成效很大。

徐永昌更痛恨日本毒化中國，推銷海洛英，爲害最烈。山西省政府通過組織「查禁毒品委員會」，以馬駿（君圖）爲委員長。規定販運者立予槍決，吸食者送收容所勒令戒除，戒而復吸者與販運同罪。雷厲風行，在太原市幾乎常常槍斃毒犯，洋鼓洋號押送刑場，令人驚心動魄，毒害

雖未禁絕，收效的確很大。

徐永昌主綏、主冀，都重視水利，主席山西省政以後，對於山西水利，有極遠大的計劃，由華洋義賑會美籍工程師塔德負責研究計劃，先組織各河河務局進行測量，完成汾河測量報告，桑乾河、滹沱河、漳河、沁河測量報告，黃河壺口瀑布利用計劃等。因二十五年陝北共產黨渡河犯晉，又因他肺病任協和醫院，水利計劃未曾實施。

徐永昌以爲教育是國家根本，對於山西教育很下一番功夫，曾由教育廳長冀貢泉（育堂）、財政廳長王平（均一）、省府秘書長王謙（尊光）審查大專院校改革專案，規定山西大學設法學、工學、理學、文學四院，法政專校併入山大法學院，教育學院併入山大大學院。工專祇開電機工程，農專開牧畜、農藝、森林三科。中小學體、智、德三育並重，將新生活運動納入教育，好讓學生們明禮義，知廉恥。

對日謀略態度強硬

日本軍閥於九一八後，向我長城各口進犯，遭受堅強抵抗，知道祇靠武力，達不到侵略目的，於是提出「華北特殊化」，想用以華制華達到不戰屈人之兵。廣田內閣五相會議會決定要使華北五省自治。他們心目中的傀儡，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榘、察哈爾宋哲元。閻資望最高，可以領導華北，他與日本委蛇，決不做日本人的傀儡。韓復榘與土匪原賢二有往來，且有密約，不讓中央部隊進入山東，但做一省傀儡可以，領導華

北還不够格。三民主義力行社成立後，爲貫徹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決定的策略：「安撫華北，穩定山東」。從事穩定山東工作的秦啓榮和中央研究，韓自以爲韓青天，廉潔不要錢，實則他需要錢。中央曾給一百萬元特支費，才使韓對中央誠心擁護，不再爲日本軍閥利用。

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在喜峯口挫敗敵人，敵人非常痛恨。藉口張北扣留日軍官事，一再逼迫，行政院免了宋的察哈爾省主席，由秦德純代理。宋哲元部隊十九年退到山西後，徐永昌很照顧他們，情感很好。他認爲宋是好漢，性烈，對免去主席職很痛心，請閻向中央建議，真除秦德純主席，任宋爲平津衛戍司令。日本人又來捧宋，誘惑宋，威脅宋，要他以平津冀察特殊化。

二十年八月徐永昌赴平，入協和醫院，宋哲元來訪，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對德國壓迫，還有點範圍內的自由，日本軍閥太毒辣了。

徐永昌說：「德國的敵人都是紳士，知自愛，講信義，所以容易對付。我們的敵人是流氓無賴，而自己又是破落戶的大少爺，以無知的少爺同無賴辦交涉，如何能不吃虧？」並舉歷史上忠奸人物爲例，說他和閻錫山都不能消極，要爲保全國家社會人民而積極。

秦德純到醫院告訴徐永昌，土肥原要華北獨立，有個組織出來。否則，恐怕劉桂堂等會來做。而不少中國人又天天拿上日本人來嚇唬中國人，問徐永昌有甚麼辦法。

徐永昌說：「應當坦白委婉地告訴土肥原，如用劉桂堂等來擾亂，我們祇有削平消滅一法。」

若日本動員若干師團來壓迫，我們自當奮起抵抗，雖然失敗，也對得起國家民族。」

又說：「今日華北之患，在各領袖愛國心不够充實，有利慾心，有排斥他人之心。若各領袖真能愛國，無慾望，能容人，則華北不見得有甚麼危險。縱有問題，也不至惶惶不可終日，如大禍將臨，無法應付。況且一個日本武官或一個特務機關長，指使幾個中國流氓擾亂恫嚇，我們幾省即從而獨立，……是否中國將來亡國，是祇一個日本武官或特務機關長指揮劉桂堂等即可達到目的？華北真要亡了，你我或可推說是宋、韓、閻等亡的，後世人能不把我我加上嗎？」

秦德純很興奮地說：

「你說的很對，原以爲你消極，甚麼也不管呢？現在我可以此見地補救明軒（宋哲元）之觀察思想了。」徐永昌的主張，正是對日本人訛詐勒索最有利的對策。

宋哲元問徐永昌：「爲謀緩和，成立個自治會如何？」

「成立自治會，中央允許則可，明軒！你萬不能允其成立。」徐永昌說的簡單明瞭。

「遲和他們拚如何？」

徐永昌又以馮玉祥當年在北平練兵和宋現在作比，說道：「當爲國家人民忍耐。明軒！你有過去的好歷史和現在的重要地位，我以為都是因有好軍隊得來的。所以有好軍隊在掌握中，即無衛戍司令名義，人亦見重。」

席不暇暖獻言當道

徐永昌由平返太原，與閻錫山商定，向中央密呈平津當前情形，請蔣委員長對宋哲元盡力撫循，消除隔閡。此正和力行社策略「安撫華北」，同一見解。得到中央的答覆，如宋哲元與日人決裂，以後官職、地盤、軍餉，絕不使他吃虧。

閻錫山表示擔保請中央以綏遠給宋，任綏綏綏靖主任，徐永昌則表示以山西省主席讓予傳作義。

徐永昌奉召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抵南京，中央已於十一日令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萬福麟、劉哲、王揖唐等十七人爲委員，宋爲委員長。十二日發表商震爲河南省主席，宋哲元接任河北省主席，張自忠爲察哈爾省主席，蕭振瀛爲天津市長。

徐永昌此次赴京，中央原欲請他接替朱培德任參謀總長，或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他以留在北方，對國家較爲有益，故仍回北方。於謁見委員長時，建議調龐炳勳部回河北，以補商震所部調河南以後之空檔。勿分散宋哲元之兵力，削弱對外抵抗力。對殷汝耕冀東偽組織不必強求解決，因爲冀東不去，華北可以少安，冀東去則華北會多事。

二十五年二月中央派徐永昌爲專使，赴綏遠主持「綏遠蒙旗政務委員會」成立，以抵制日本傀儡德王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徐永昌原兼之三十三軍軍長交孫楚，改任山西清鄉督辦。

六月兩廣事變，十一月徐永昌第二次奉召抵京。蔣公問他對時局意見，他說：「川粵兩省收入，可抵全國收入半數。豫魯收入不及四千萬，晉冀陝各一千六百萬，察綏甘寧青共二千餘萬，

是十省收入祇抵一廣東或四川，而十省行政費用，則較川粵為鉅。今欲以二分之一收入而言抗日，前途危殆，可以想見。今幸天假以便，粵事不戰而平，桂事自可和平解決。」

蔣公仍欲他任參謀總長，力辭，蔣公囑咐：「最近如往冀魯，切盼對宋韓談談中央態度。」並囑回山西後，致意閻錫山，謀安宋韓。

十月十三日，徐永昌第三次奉召入京，赴杭州謁見委員長，蔣公問他對日外交意見，他說：「外交自係對日整個辦法，但無論如何有結果，終不能止其在華北的侵擾。一則日政府已無法統制其軍人，再則彼仍藉口無所謂匪偽，直是華人自擾耳。」

十月二十一日，對華北事，曾向蔣委員長建言：「東北軍未必通共，不可自疑，惟其官佐心神無寄託，軍紀不良，是屬事實。閻先生精勤穩練，苟以國事屬之，尤能顧全大局。明軒好勝，苟無異志，所任豈不苦重，中央應時加獎勵，凡有長短之者，一概峻拒，此不容猶豫者。方向明快對外決無他虞，中央亦應以對宋者對之。」

二十三日返太原。十一月三十日偕閻錫山及傅作義飛西安，因蔣已先一日赴洛陽，乃偕張學良乘隴海車東行，三十一日晨抵洛陽，集團慶祝蔣公五十華誕。

得道多助參贊戎幕

西安事變後，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四次奉召入京，對陝西善後，主張不論張漢卿回去與否，對東北軍須有確實保障辦法。後至漢口，蔣公詢問

對陝西及西南等事，他建議：「中央今日有如此地位，十之七八由委員長迅速之軍事得來，現在則宜在得道多助四字內着力，不需要再用迅速手段截糾葛了。」

二十六年二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徐永昌由晉赴京出席，代閻向大會提出「綏東雁北國防設計草案」。適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病逝，由徐永昌繼任，三月八日視事。此時國內情勢，非常樂觀，東北軍善後，已有適當處置，楊虎城出國考察，廣西方面，白崇禧表示，中央何時要他來，他隨時可來，四川更趨穩定，各方隔閡大都消除。

全國軍隊計有一百九十多師，軍官十三萬人，士兵二百萬。軍政部開始整頓，充實小單位，減少大單位，提高士兵待遇，增強戰鬥力。國防工事準備，已開工繼續完成者：漳河北岸、隴海運河、魯南、浦東、崑山支塘、錫澄、滬杭陣地；新增者：魯東、杭州、吳興、晉綏、滄保線、平漢橋頭堡、津浦橋頭堡、廣東等，分別派專人指導。

廢寢忘餐前線指揮

七月七日日軍在盧溝橋製造事變，當時平津冀察駐軍祇有二十九軍的四個師。三十七師馮治安部駐北平，豐臺、保定一帶；三十八師張自忠部駐天津、廊坊、滄州一帶；一三二師趙登禹部駐河間、大名一帶；一四三師劉汝明部駐張北、張家口、懷來一帶。

日軍在盧溝橋未得逞，詐稱誤會，進行談判

，實則國內動員五個師，開向華北，駐朝鮮一個師開到東北。二十六日日軍向我攻擊，全面抗戰開始，組織委員長石家莊行營，派徐永昌為主任，林蔚為參謀長。徐永昌於三十日到達保定，二十九軍已於二十九日撤離北平，留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及代理市長。

徐永昌因肺病嚴重，辭去山西省政府主席，又因華北局勢緊張，席不暇暖，不能專心養病。現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不到半年，抗戰開始，到保定、石家莊指揮作戰，廢寢忘食，有時一天祇睡兩三小時。當時平漢路方面部隊龐雜，他勉勵他們要貫徹中央命令，他說：「我們如不聽中央命令，如何能教部下聽我們的命令。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表現在行動上，不要讓歷史給我們留下空白。」

九月二十四日保定失守，十月五日石家莊行營移順德，徐永昌奉調軍委會第一軍部（軍令部）部長，石家莊行營亦撤銷。十三日抵鄭州，得悉第二戰區三十四軍一九六旅旅長姜玉貞以孤軍固守崞縣原平，奉命堅守七天，以待忻口完成準備，姜旅長守了九晝夜，傷重陣亡，全旅傷亡殆盡。這是抗戰開始後，最英勇壯烈的一場戰鬥，才使忻口抵抗，有了充分準備。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